

提前為香港占中做個總結

香港的佔中已超過 50 天,清場已經開始,最後的堅持徒有形式,見不到多少意義了。運動的合理性原本就不大,初期的高潮過後即開始迅速流失,到現在已所剩無幾。照這個樣子下去,不用別的,時間本身就會抹平一切。

雖然事關政治,到底脫不開人之常情。每個人都有疲勞曲線,也有忍耐曲線,還有遺忘曲線和興趣轉移曲線,一直在挑戰這些曲線的鬧事者不會不明白,憑他們手中那點花樣和噱頭,逆轉不了強大的自然規律。50 天的時間,中央堅持原則不動搖,特區政府和香港警方也都沒有犯錯誤,缺了對手戲,他們很快就沒了藉口,再也無力掀起新的浪頭。

無力感的最後展示,是幾個昏頭學生再做激烈抗爭狀,煞有介事地表演上京對話新戲碼。這就淪為徹底的胡鬧了。試問:你要上北京,佔着香港的馬路干什么?!你要對話,公開違法犯法為哪般?!在機場被拒登機,怎么不乾脆佔領機場、衝擊禁區?!

既然這 50 天來你們賣的就是少不更事、不知深淺,又憑什麼上北京討論高深複雜的政治問題?既然這 50 天來你們一再侮辱和挑戰中央的威權,又憑什麼要北京尊重你們的意願和權利?

這些問題,昏頭學生們一個也回答不了。

根本的問題,當然在他們自身。世人見證,50 天來佔中示威者拼命在演戲,但卻一直苦于

無法入戲。他們想要扮成“民主法治”的啓蒙者,演出來的卻是反民主的強姦民意、反法治的違法抗法;想要扮成“拯救香港”的救世主,演出來的卻是經濟的重創、民生的塗炭、香港整體形象的跌落;想要扮成“愛與和平”的抗命人,演出來的卻是機關算盡、另有圖謀的政治打手...

無法入戲就只好改爲胡鬧,只好花拳綉腿真戲假唱,最後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邊拉開街頭血戰警方的架勢,一邊又連連求助警方的安全保護;一邊極盡辱罵和諷刺政府之能事,一邊又要求取得與政府的對話資格;一邊擺出大義凜然爲民抗命的姿態,一邊又在暗中經營着自己的個人利益.....

政治上的大事,豈是靠半瘋半傻的胡鬧辦成的?如果這就叫搞政治,豈不侮辱了太多的正常人?

一場初看起來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50 天後鬧成這個可笑模樣,可以說,連最起码的合理性也丟光了。

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日前曾表示,佔領愈久愈不合理。這句話總算說對了。50 天的佔

中,經濟和民生損失了多少,品牌和形象跌落了多少,民主和法治倒退了多少,每一部分都實實



在在,也都可以精確計算出來;而佔中示威所要爭取的東西,那個“國際標準的真普選”,那個隱藏在激進政改背後的美好明天,卻是一個誰也說不清楚,連是真是壞都不知道的臆想夢幻。

爲了夢幻的、想當然的、不確定的、無法計算的未來,先賠上諸多現實的、已有的、確定的、可以計算的寶貴資產,這太不像是最具資本主義精神的香港人干的事情。“佔領愈久愈不合理”這句話想表達的意思就是:佔中運動也有“資產負債表”,50 天的佔領並沒有在未來收益這一欄增加任何確定性,但當前成本卻每一天都在急劇增加,再繼續下去,當前成本必定大大超過未來收益,而無人再敢站出來承諾未來的好處能夠彌補當下的損失,整個運動將完全喪失合理性。

這是一個理性昌明的時代,失去了合理性的抗爭,不叫維權,叫自殘。

三點總結

總結之一:50 天佔中所表現出來的反理性、反常識和反時代特性,歸根結底是 19、20 世紀世界性烏托邦狂熱的余溫,這種狂熱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早已取得勝利的“中心地帶”仍能掀起偌大的社會動蕩,暴露出香港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因新界開發糾紛衝擊立法會的民衆高唱《國際歌》,罷課上街的學生使用文革的語言和口號,示威集會打出“反資反殖”“身土不二”的標語,這都是左翼運動的表現;與此同時,佔中各個組成部分的核心人物,“禍港四人幫”,激進泛民派議員、學聯和學民思潮,卻又無一不直接或間接受美英勢力的操縱,與西方國

家反人民民主、反紅色政權的全球戰略保持一致,這又反映出極右勢力的面目。

左翼和右翼都可以輕易利用香港社會的內在矛盾掀起動亂,挑戰政府,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需要引起重視。

總結之二:如果說佔中運動這種左右開弓的戰略歸根結底帶有反中的終極目的,用左翼抗擊中國的經濟,用右翼抵制中國的政治,掩護港獨的推進;那麼,這場運動倒可以算作一場提前進行的戰略演習。從陰謀勢力的角度看,50 天的佔中,各方陣營大亮相,港獨運動可以藉助的“主力部隊”有哪些?可以動員的“友軍”又有哪些?各自的戰鬥力如何?而以政府爲首的“敵方陣營”又有哪些力量?其反擊策略如何?倒也逐一都看清楚了。

不知道他們內部的總結報告做出來沒有,憑我猜測,港獨派應該很失望。預想的政府進退失據沒有出現,大規模流血沒有發生,民衆暴動沒有爆發,國際聲援沒有起來;反倒是政府沉着穩重,警方高度專業,民衆多數反對,海外紛紛譴責。50 天時間雖然不短,但畢竟大勢已去,頹勢難挽。

一場佔中,暴露出港獨勢力在利用各種機會測試其長期戰略,從抵制 23 條立法,到阻擊國民教育科,再到這一次的“顏色革命”預演,一環扣一環,步步深入。這也是一個值得引起重視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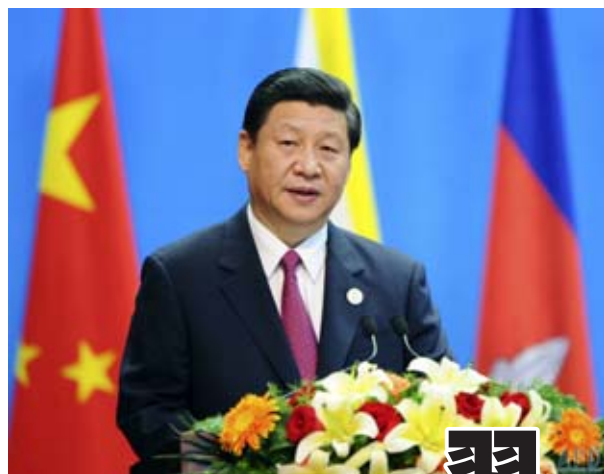
總結之三:從中央政府的角度看,50 天的佔中,到現在這個局面,也應算是一個不錯的結果。左右兩派充分表演,港獨勢力充分暴露,其實都是好事。

這 50 天時間,中央方面只打了一張牌,就是堅持既定方針不動搖;但香港政治舞臺上卻是各方勢力集體亮相,因爲運動起來了不亮相不行,不亮相不表演就要出局,所以全都使出了看家本領。50 天時間,誰是黔之驢,三招就玩完,誰是淵中龍,見首不見尾,誰是牆頭草,隨風來回搖,也都差不多看清楚了。

最後,50 天的佔中,對於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和處理危機能力,香港警方的治安和抗暴能力,主流社會抵制動亂和抗擊外部勢力的能力,也都是次全面的檢驗。而佔中以失敗告終之時,正是這些方面的能力得到確認之日。

綜合來看,一場佔中,具體的損失是巨大的,但從整個國家方面看,所得其實也不小。再考慮到此次事件對於未來中央香港政策的調整、京港兩地的互動等方面的積極推動,更不妨以壞事變好事的心態看待之。

文揚 2014 年 11 月 17 日



11 月中,借 G20 峰會之機,習近平再次向世界表明中國和平發展的意願和決心。

他在澳大利亞聯邦議會發表演講時說,中國是一個擁有超過 13 億人口的大國,是“人群中的大塊頭”,其他國家“肯定要看大塊頭要怎么走、怎么動,會不會撞到自己,會不會堵了自己的路,會不會佔了自己的地盤”。

然而他再次強調,“中國雖然是個大塊頭,但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先人就認識到‘國雖大,好戰必亡’的道理。”

這是習近平在一年之內再次發表“大塊頭”論和“好戰必亡”論。今年春天他出訪歐洲,在 3 月 28 日于德國柏林科爾伯基金會的演講中他曾說:“有着 5000 多年歷史的中華文明,始終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諧的追求深深植根於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國人民的血脈之中。中國自古就提出了‘國雖大,好戰必亡’的箴言。‘以和爲貴’、‘和而不同’、‘化干戈爲玉帛’、‘國泰民安’、‘睦鄰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傳。中國歷史上曾經長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但沒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國的記錄。我們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對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熱愛和平的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習近平反復強調當今中國的和平發展與中華文明 5000 年和平理念之間的繼承關係,這其中的深層含義,恐怕並不容易爲西方領袖們所理解。

身處 21 世紀的世界戰略格局當中,西方關於國際和平的認識和理解,脫不開近代世界歷史的框架。近者,有二戰後“泛美利堅和平”、冷戰時期“核平衡”、“核恐怖”下的和平;遠者,有一戰戰後“集體安全”下的和平、維多利亞時期“泛不列顛和平”、拿破侖戰爭後“歐洲協調”下的和平;最遠,就是 17 世紀 20-40 年代黎塞留時期“均勢體系”下的和平。

回顧歷史,正是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樞機主教黎塞留開創了近現代世界的基本格局,因爲他所推行的“國家至上”和“權力均衡”原則,在當時是作爲反正統,也就是替代神聖羅馬帝國大一統思想的新型理論而提出來的,正是在民族主義浪潮衝擊之下分崩離析的歐洲的產物。此後的三個多世紀直到今天,從某種意義上講,整個世界仍是黎塞留的世界,猶如是 17 世紀歐洲的擴大。美國就是擴大的英國,前蘇聯就是擴大的俄國,歐盟就是擴大的法國和德國...變化的是版圖和權力的轉移,不變的是主權國家體系和大國的均勢平衡。

主權國家體系和大國的均勢平衡,相對於西方文明歷史,的確是“現代的”,是與中世紀的決裂,其理論基礎與一整套西方現代主義哲學一脈相承。其中,列強間的“共同安全”理念,明

習近平的「中華版和平承諾」

顯是亞當·斯密關於個體自私的利益追求會自動促進公共利益之增長這一思想的產物。

然而,歷史見證,“現代的”並不必然意味着是“進步的”,線性歷史觀終久是個幻覺,正是空前黑暗野蠻的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和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引起了對於西方現代主義宏大敘事根本上的質疑和反思。如果“後神聖羅馬帝國”時代並不意味着進步,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大退步;如果近代以來歐洲的大分裂、戰亂頻仍和文明毀滅無非是西方版的“禮崩樂壞”和“戰國時代”,是羅馬大一統解體之後的一次衰敗周期;那麼,所有近代以來的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戰爭與和平理論、大戰略和大外交理論,到底還有多少恆久價值和指導意義呢?

若將這一西方版 300 餘年“戰國時代”與中華 5000 年歷史的和平傳統、仁義傳統相對比,問題就更加突出。可以說,對於這一早熟的、包含了多個戰國時代和大一統時代交替周期、多次克服了分裂戰亂走向和合共生的偉大傳統,當代西方很難把握,因爲大大超出了經驗範圍。在西方人將有限的歐洲經驗套用到整個世界的嘗試和努力中,中國始終都是一個巨大的難題,300 多年的歷史無法覆蓋 5000 年的歷史,西方中心的世界無法包括中國這個曾經的東方中心。

所以,當習近平一再強調中國有着幾千年和平主義傳統時,西方不應該再誤解。他並不是僅僅在將中國和近代以來的德國和日本區別開來,和前蘇聯區別開來,以說明中國不會走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老路;實際上,他是在將整個中國歷史作爲一個新的坐標,新的參照,與近代西方世界形成一個重新對比。其中不言自明的含義是:西方近三百多年的歷史,更應當被視爲一個特殊時期,是歐洲大一統體系瓦解之後的一個“戰國時代”,並不具有恆久的意義;在這個歷史時期中生成出的關於戰爭與和平的觀念,更非普世真理。中國人兩千多年前就從自己此前兩千多年的動蕩歷史中總結出了“國雖大,好戰必亡”的歷史經驗,產生了“以和爲貴”、“和而不同”的信念,豈不更值得當作今日世界之借鑒?

如是觀之,中國關於和平發展的承諾,歸根結底是一種超脫出近現代西方“永久和平”觀念體系的“中華版和平承諾”,聯接着極爲悠久的傳統,包含着極爲豐富的内容。

“國雖大,好戰必亡”典出《司馬法》,該文開篇即說:“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于戰,不出于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

對於戰爭與和平的這一“仁義觀”之下的理解,大大超越了當今時代。縱觀近現代以來西方發動的歷次戰爭,歸根結底都是利益之戰,基本上可用“春秋無義戰”一言以蔽之,距離真正的仁義標準,相差甚遠。

這就是習近平“中華版和平承諾”的現實意義。將歷史坐標從近現代幾百年的小參照系重新拉回到上下數千年的大參照系當中,會形成更宏大、更恆久的和平觀。如果這一深植於中華仁義傳統的和平觀得以推行,並影響了世界,也算是中國爲世界做出的一大貢獻。

文揚 2014 年 11 月 22 日

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律师经验丰富, 祝您事业马到功成

我们拥有超过50位律师的专业团队, 能为您提供在商务、房地产、税务、知识产权及证券金融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服务。

欲了解更多详情, 请联系唐永昶律师或徐佳佳律师。

BMD
BRENNAN, MANNA & DIAMOND
ATTORNEYS & COUNSELORS AT LAW

地址: 75 East Market Street, Akron, Ohio 44308
网站: www.bmdllc.com

唐永昶律师
电话: 216-534-1317
电子邮箱: jtang@bmdllc.com

徐佳佳律师
电话: 330-253-9195
电子邮箱: vjxu@bmdllc.com